

文史通讯

注意
保存
内部
刊物

4

1980.8

目 录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正副主任

- 办公会议…………… (1)
-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史料工作概况…………… (4)
- 重要的责任……………王新亭 (5)
- 必须杜绝乱用我会资料的错误做法
……………本刊编者 (19)
- 文史资料出版社成文…………… (3)

资料摘登

- 向忠发不是叛徒吗?
——一次座谈会纪要……………本刊编者 (6)
- 记叶挺将军被囚期间的一些情况……………沈 醉 (7)

地方文史资料工作情况

-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10)
- 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上的发言……………王煜文 (11)
-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
…………… (17)
- 青海省政协召开文史工作座谈会…………… (18)
- 新书简介…………… (16)
- 简 讯……………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举行正副主任办公会议

本刊讯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六月六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举行了三次主任、副主任办公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各业务组组长副组长和文史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在五月二十三日会上，首先由文史办公室主任董一博同志汇报了文史工作恢复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对今后的文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接着，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发言。

王首道主任说，一九七八年文史委员会成文时，齐燕铭同志还在，那次会开得很好，大家热情很高。之后，文史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不少成绩。现在的问题是出版工作赶不上编辑工作，编辑工作又跟不上大量的资料工作，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成立了文史资料出版社，也想筹办印刷厂，这就为文史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何长工副主任说，前几天我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提了两个意见，一是文史委员会要加强力量，找几个年青一些的同志当副主任，二是自己要搞个印刷厂。他还说，《文史资料选辑》在社会上评价还是好的。征集的稿件一经整现就成了话的文史资料，不仅可供历史研究的参考，而且对后代也有教育作用。当然目前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还有不少困难，相信大家一定会发扬积极性，努力克服困难。现在文史工作已经敲开了锣鼓，这是好的开端。

徐彬如、王昆仑副主任都在会上发了言，提出要加紧“抢救”资料问题。

五月三十日由军事组、政治组介绍业务组工作情况与问题。

军事组组长刘奇同志说：“军事组今年开过四次组会，一次组长会，讨论和制订了一九八〇年的工作计划。为了避免重复，避免浪费，提高征集工作质量，要求有针对性地征集史料，缺什么，补什么。先发函请撰稿人自报题目，然后再决定是否约写。”

他还对稿子的整现、出版和稿酬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政治组组长焦实斋同志汇报了政治组工作概况，他说。自今年一月到现在，共征集史料一百六十四件，三月二十八日参加“民革”中央和北京市“民革”的

征集史料座谈会。这个座谈，推动了“民革”中央和地方的文史资料工作，并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四月三日，召开全组工作会议，确定今年工作规划。今年征集工作除一般征集外，有五个重点和五个人物。五个重点是：（1）国共合作史料；（2）民主党派史料；（3）桂系史料；（4）老一辈民主人士回忆录；（5）国民党外交史料。五个人物是：蒋介石、傅作义、卫立煌、陈绍宽、邓宝珊。计划在六月五日召开征集国民党外交史料座谈会。外交方面的史料过去有一些，但比较零碎。邀请参加这次座谈的，有一部分是经历丰富的老人，也有研究外交问题的专家。这个专题，以后拟商请李铁铮、凌其瀚委员负责。

他还谈到了政治组工作的一些体会：

（一）为了充分发挥全体组员的积极作用，采取分题包干的做法，分工负责，计划制定以后，将各个重点或专题，在组内分了一些小摊摊，从联系约写到走访。代请“写手”，各个重点，各有专人，各负专责。例如，国共合作史料，主要由田一明负责；民主党派史料，主要由李平衡负责；桂系史料，主要由程思远负责；老一辈民主人士回忆录，主要由焦实斋负责；敌伪史料，主要由溥杰负责；七五年特赦人员史料，主要由尚传道负责。又如，征集傅作义的材料，经过通信走访，联系了七十余人，这些人从不同侧面对傅作义先生都有所了解。除北京由杨格非负责外，山西、内蒙方面也有人专门负责。征集邓宝珊的材料，兰州方面请沈求我（邓的秘书）负责，西安方面由胡景通负责（国民二军胡景翼之弟）。这样，全组组员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组的工作计划也得到层层落实。

（二）政协的征集史料工作要与民主党派密切协作。政治组过去同民主党派组织缺少联系，采取手工业方式，一人找一人，效果不好。同党派组织协作，既依靠了他们工作，又推动了他们的工作。

掌握史料的人，大多是民主党派负责人；老一辈民主人士，也大多是在民主党派；至于民主党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当然更要由各个党派自己来写。陈绍宽、邓宝珊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去年我们给面安、兰州、福建发函征求关于他们的史料，没有收获；今年通过“民革”集会的渠道，才找到了线索，取得了成果。我们的征集工作，如果不同民主党派密切协作，就不可能很好完成任务。

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到写党派史的困难，主要是，资料不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不同看法。最近中央统战部在一个文件中表示了对编写民主党派历史问题的意见，当前主要是广泛搜集，抓紧组织力量，把老人的史料“抢救”下来。

自四月十一日八个党派召开文史工作座谈会以后，工作先后展开。有的成立文史工作小组，有的配备了专职干部。民盟、民建写出了大事记，农工写出了简史，民革写出了党史简介。老一辈民主人士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已开始，季方副

文史资料出版社成立

〔本刊讯〕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批准，文史资料出版社正式成立。

该出版社除继续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原由中华书局出版）外，还将重印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26—55辑（1—25由中华书局重印），新出版文史资料丛书。新近计划出版的有穆欣著的《陈赓同志在上海》，张治中著的《我与共产党》，还有《溥仪在伯力拘留所》和《文化史料（丛刊）》、《工商史料》（丛刊）、《革命史资料》（丛刊）、《特务戴笠》等。

出版社的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二十三号，电话：666160、666841。

主席写《农工党的前身》，钟复光委员写施复亮，尹冰彦代屈武委员写回忆录，已接近完成。

（三）走访撰写人，特别是走访年老有病的撰写人，是有效的征集方法之一。以前走访过很多人，今年又走访了二十多人。经过走访，交谈，代请写手，计划逐步落实。

焦实斋组长还提了几点建议。

政治组副组长许宝騄说：“文史资料，征集了史料，但‘文料’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过去习惯于私人著书，无出版机会。‘文料’是否也要搜集。”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顾问曾三同志也发了言。

他说，档案材料是真凭实据，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段历史档案都在南京，要进行整理，准备开放。回忆录可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但回忆录难免有记忆错误的地方。例如有份材料说王明到了瑞金，王明从来没到过瑞金。又如北平和平解放到傅作义那里去联系的是我而不是曾山。回忆录要写，还要核实。既有档案，又结合回忆录，相互补充，殊途同归，这就好了。

关于地方志，曾三同志认为还是要搞。

六月六日，文化、教育、工商、经济、科技、社会等组汇报了工作，各组组长、副组长张毕来、吴作人、钱昌照、庄明理、邱及、张楚琨、董纯才、戴伯韬、裴丽生、吴觉农、吴雪之等同志先后汇报，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这次办公会是文史工作恢复以来第一次，大家希望以后成为制度，以推动文史工作搞得更好。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史料工作概况

一、联系有关单位，争取支持和帮助

两会中央史料工作委员会筹建之初，由于干部力量不足，兼之缺乏经验，对如何开展史料工作感到有一定困难，为此我们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工商组、政治组联系，争取他们的领导和帮助，吸取他们对史料工作的经验，联合举行了数次座谈会，讨论如何进行工作问题。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同志表示全力支持，并允予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有关工商史料，对于有系统、有分量的史料，准备出版《史料丛刊》。这对于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接着，我们通过政协，邀请各兄弟党派具体负责史料工作的同志座谈，借以沟通情况，互相启发，交流经验和意见。增强了对我们工作的信心。

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们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人民大学党史系教研室等史学机构挂钩，介绍情况，提供史料，征询意见，共同研究，争取他们当我们的义务顾问，同时配合他们的史料要求，邀请一些老同志回忆自己的经历，由他们录音整理，既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又丰富了我们的史料。

最近又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允予辅导和帮助。

二、广泛收集和“抢救”有关史料，逐步开展

两会的史料，在十年浩劫中不少被销毁散失，“抢救”史料是两会史料工作的当务之急。现在我们已调集了存在档案中的有关材料，抄阅有关的报刊记载，同时，对有影响的一些老同志，请他们用写《回忆录》等方式提供史料；对已故的代表人物（如章乃器、施复亮等），已指定专人，以写他们的“传记”、“年表”等方式，整理他们的史料。目前，已编印了《民建会会史参考资料》1—9辑，作为内部参考。全国工商联最近发出了239号通函，附有征集史料的《参考提纲》，要求各地工商联组织尽量提供史料，为编写《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史》作准备。

三、编写两会各自的《大事记》，为撰写史料性会史作准备

我们编写两会各自的《大事记》，企图初步理出两会创立、发展及其活动的概要，有助于会史的整理；同时，在征集史料时也有利于“按图索骥”向有关者征集。现在，民建会《大事记》（上）（1945—1949）、（中）（1949—1956）、（下）（1957—1979）初稿，已打印分发各地两会组织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全国工商联方面，《大事记》也在整理之中，估计下丰年可以陆续印发，征询意见。

重 要 的 责 任

王 新 亭

党中央负责同志提倡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要我写一篇短文，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回想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老同志已经写过一些革命回忆录，象《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就发表过不少。几位老帅还在这方面起过带头作用。这些革命回忆录，是革命历程的忠实记录，又是革命传统的良好教材。本来这是无可非议的好事。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却利用革命回忆录来整人，什么为某某或自己“树碑立传”呀，什么“三反言论”呀，实际上这些罪名都只不过是别有用心之恶毒诽谤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帮”又费尽心机地伪造和篡改历史，炮制丑文，连篇累牍地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制造舆论，以便达到篡党夺权的阴险目的。这种是非颠倒的反常状况，反映了十年浩劫的一个侧面。经过党中央拨乱反正，这场恶梦早已成为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写革命回忆录了。

中国革命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伟大事业。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其它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迎来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样长期的革命历史，是艰苦而又光荣的历程，有许多优良的传统，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这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使之留传万世。我们老同志，亲身亲历了过去的斗争，趁着脑子还清楚，健康状况还允许的时候，撰写革命回忆录，把自己经历过的有意义的事情反映出来，就是必要的了。

进一步说，撰写革命回忆录，还有两层意义。其一，对后来人起传帮带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这里，首先是选拔人材的问题，要把那些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有工作能力、年富力强的同志，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这些同志还缺乏领导经验，老同志有传帮带的责任。写革命回忆录也是传帮带的一种形式。接班的同志可以从革命回忆录里看到，我们过去有哪些好传统、好经验，有哪些挫折和教训，从而得到教育、启发、借鉴。这样，有助于加强思想修养，增长工作才干，少走一些弯路。

其二，作为研究问题的参考。革命回忆录是宝贵的历史资料。（下转第15页）

向 忠 发 不 是 叛 徒 吗？

——一次座谈会纪要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一九七九年第一辑，登载了由李华明、沈忆琴两同志访问整理的张纪恩同志的回忆《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对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于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叛变的问题提出质疑，并就一些材料说明向没有叛变，不是叛徒。

关于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的问题，早有历史结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再次明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并在信的附件《大事记》中写着：“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而现在又出现了向未叛变的说法，立即在党史界和一些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特别了解情况的一些老同志更为关注。

为了弄清向忠发究竟是不是叛徒问题，一些了解情况的同志于今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参加会的有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李慧（沫英）、陈琮英、黄文容（玠然）、周惠年、朱端绶、章夷白等同志，张纪恩同志也应邀参加，另外，还邀请了党史研究室、毛著编委会、中央党校，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有关同志以及对向忠发问题作了调查研究的高军同志参加了座谈，上海党史调查组的李华明同志等也参加了会议。

座谈会发言热烈。

李沫英同志说：“我被捕后关在龙华司令部女监，有一天到水池子用水，一个国民党特别监的年青军官悄悄对我说，共产党的向忠发被捕了，我吃了一惊，第二天，他又告诉我，向忠发反映不好，意思是叛变了。后来，张越霞曾告诉我：‘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说我党分成几派等等……’”

陈琮英同志（当时机要交通，住向忠发所在的机关）接着发言，她说：“我亲眼见到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出卖了我们的人。他被捕后，我们也就被出卖了，我们被带到法国巡捕房，敌人就带着我们上楼和尚忠发对证。向忠发一见我就说：‘你也来了！’我说：‘还不是你搞的！’他向敌人指着我说：‘他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他又向敌人献殷勤，对我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因我坚持自己是从乡下被他们骗来的，敌人也没法。敌人又急于去抓中央领导同志和破坏我们的机关，就匆匆带着向忠发去逮捕周恩来和瞿秋白同志去了，由于我党早得到情报，领导同志和重要机关都转移了，敌人扑了个空。只逮捕了张纪恩和张越霞同志。一九三二年我从狱中出来到中央苏区，曾把向忠发被捕叛变的情况向周恩来同志和任弼时同志汇报过。向忠发叛变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们都是见证人嘛！”

黄玠然（文容，当时中央秘书处负责人）同志接着说：“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早晨五点多钟，我到张纪恩住的机关（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去，刚走到楼下后门准备向前敲门时，忽然看到二楼凉台上我们一个装扮阿姨的同志一面向我使眼色，一面用一个泥块向我打来，意思机关已被破坏，要我快走。很快我就接到警报，说向忠发叛变了，破坏了我们的机关。”他还说：“去年我到邓颖超同志那里，她对我说，向忠发是叛变了，说她当时很快得到了消息，搬了家。”

朱端绶同志（当时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说：“我所在机关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地方，几

次同志被捕都没搬家，就是向忠发被捕后，中央通知我们说向忠发有问题，这个机关才不能用了。”

周惠年同志（时中央特科工作人员）说：“向忠发被捕后，根据周恩来同志布置，我们特科都准备好了武器，马上就要出发营救，突然接到情报，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因此营救活动取消了。周恩来同志也匆匆转移到我那里，看出来是出事的样子。”

张纪恩同志也表示应以事实为准，他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家还对向忠发怎样被捕的进行了座谈，普遍的说法是敌人在汽车行布置了特务，向忠发去叫汽车时，被车行会计告发逮捕了，向被捕后，马上向敌人跪地求饶叛变了。

由于敌人带着向忠发破坏我们的机关和逮捕中央领导同志都扑了空，故对他不怎么感兴趣了，正在这时，敌又接到蒋介石从庐山发来命令对向忠发就地立即枪决的电报，向忠发这个叛徒企图以出卖同志苟且贪生，也没有保住狗命。终于象一条癞皮狗被处死了。

座谈中，许多同志认为，历史只能是真实的反映，决不能用现在的思维去推断历史上的事，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本刊编者整理）

囚禁期间的叶挺将军

沈 醉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一个很长时期，蒋介石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便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将军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有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一九四三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作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这个人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小铁锅，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便可点燃。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呵！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地说：“我这两年一直和他作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认出来。叶将军看了那乘轿子，很不高兴，不想乘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将军才勉强答应了。我们紧紧跟着，还有二十多名便衣

警卫都分散在前前后后。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所以把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我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将军乘一辆汽车，前后都有一辆警卫汽车，一直把叶将军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希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将军用的。

在返回途中，我埋怨沈默为什么不给叶将军理理发，弄成这个样子，多惹人注目。他便告诉我一些叶将军被俘后的情况和在桂林的生活。他说，叶将军自被俘后，便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的精神，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将军在桂林弄了一头奶羊，每天亲自去放牧和割草当饲料，自己挤羊奶吃。这次原想把羊一起带走，因坐飞机不便才没有带。叶将军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平时对一些看守的小特务态度很和蔼，从不要求做规定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是一些大官去见他时，越是官大，他的态度也越坚决、严肃，总是抗议为什么囚禁他？……我回军统局见到戴笠时，便把叶将军已解到重庆及在桂林的情况向他报告。他指示我，在生活方面可以好好照料一下，并再三告诉我一定要使叶将军理理发，因为蒋介石可能要见叶；隔不多久，有天戴笠便告诉我，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要去看叶将军，要我先去准备一下，特别是给叶将军理好头发，换一套好点的衣服，房间也要弄整洁一点。我立即带着理发师和副官等去见叶将军。我先和他谈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问题，他表示没有什么要求。最后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说重庆的天气如何闷热得难受，许多人头上长虱子等一类话，劝他把头发稍许剪短一点。不料话刚出口，他便看出我去的用意，马上睁大着眼睛，很严肃地对我表示，不获无条件释放时，他是不会剪去头发的，天气再热也能忍受。叫我不要替他担心。我印象很深、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我决不会为了见我所不愿见的任何人而修理须发。”衣服也不肯换。我碰了钉子只好回去向戴笠复命。他说，这个人的个性一向倔强，他爱怎样就由他去，以后慢慢地来，不要太性急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陈诚便去看叶将军，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的态度傲慢，叶将军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伏在窗子外边。他们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想请叶将军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征求叶同意。叶将军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并且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问得陈诚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他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昂，出去时便垂头丧气，什么话也没有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将军，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将军的态度更为强硬，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又匆匆走了。

自从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而把他从望龙门二十二号移送到中美合作所内白公馆囚禁。叶将军便在这所座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正房内囚禁了一年多。以后，因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这座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将军一个人移到中美合作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直到一九四

五年冬天释放时为止，因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合作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用的，警卫特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叶将军被囚禁在军统期间，我去看过他三、四次。每次问到 he 生活上缺少什么时，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日很早起身，便洗冷水澡，作一会体操。早餐后便看书报。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很厌恶，每拿起看一下，便丢在一边。但因 he 一直是单独囚禁，没有人和 he 谈话，所以往往只好把丢在地上的报纸又拾起来再看下去。当时白公馆的看守所所长侯子川，是一个很凶残的家伙，动辄对犯人打骂，但他对叶将军却不敢随便，有时 he 去见叶将军，叶将军还劝告 he 不要对人太过分等一类的话。

叶将军移禁白公馆不久，戴笠有次去附近看中美合作所房屋建筑工程，顺便去看看 he。当时我和总务处一个管工程的科长侯桢详一同陪着去的。看守所所长侯子川马上叫人进去通知。我们进去时，叶将军还是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柄大葵扇在纳凉。平日我去看他， he 还有说有笑，而那次戴笠去看 he 时，却爱理不理。侯子川怕 he 不知道，便告诉他：“戴先生来看军长。”叶仍坐着不动，只回答一声：“我早知道了，你不是已派人告诉过我？”戴笠向他打招呼，他把嘴嗽一下：“请坐”。戴一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也只问了他一下生活情况， he 仍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笠一看 he 这样冷淡，心里老大的不高兴，连坐都没有坐，站了一会便走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我又特地去看过一次叶将军。当时，我有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心理，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要做的什么事情。因为军统监狱中也常常囚禁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军统大特务，他们在释放出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先与家里的人见面，如何去吃一顿多年来想吃而吃不到的东西，或先去照一张相片，……等一类个人享受，以补偿被囚禁期间的损失，而我那次问到叶将军时，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听了我的话以后，象是有长时间的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回答我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 he 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是绝不懂得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即为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长期忍受着监狱生活的种种折磨和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其实，我一直受到戴笠的指示，企图能从生活上使 he 多提要求，而逐步使 he 改变态度，转到蒋介石那一方面。所以当我听了 he 那坚定明确的表示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并把这一情况报告戴笠。他听了不作一音，很久之后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将军交换马法五。戴笠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将军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叶挺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将军的头发已长得披到肩上，胡子也已到了胸前。当他上汽车前与我告别时， he 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以骄傲愉快的神情，抚着长发和胡子对我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要把他们自动剪下来，但是我还是要好好保存起来。”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天津市政协秘书处讯〕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三月七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协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王煜文同志主持。会上，何宗谦、黄钰生、杨天受、李麦、袁东衣等同志分别就工商组、科技文教组、经济组、革命史组、政治军事组过去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交流了搜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工作的经验体会，提出一九八〇年的工作设想。

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恢复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逐步健全了工作机构，充实了人力，加强了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掌握线索；广泛发动了各界老年人士，目前经常保持联系的社会老年人士达二百余人；征集到有关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史、现代史资料三百六十篇，约二百四十三万字，出版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五辑。与会委员对于能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感到满意，认为市政协的文史工作已经初步打开了局面。

委员们在讨论中重温了周恩来同志关于“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对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老年人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项光荣任务。老年人的许多亲身经历资料是不见诸书刊、档案的，把它记录留存下来，就是研究现代史的可贵资料，否则就是一种损失。再者，要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必须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也需要提供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因此，老年人士撰写文史资料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的一条具体途径。

委员们表示，搞四个现代化一天不能耽误，“抢救”文史资料也同样是一天不能耽误，一定要加强“抢救”史料的紧迫感。特别是地方革命史料，过去没有下力量进行征集，现在更应该把“抢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

在撰写史料必须坚持“存真求实”原则的问题上，大家普遍感到过去思想上受束缚，有禁区，不能对旧时代的人进行客观评价，更怕被扣上“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的帽子。老干部们也说林彪、“四人帮”打倒了一大批老一辈的革命家，使中国革命史的撰写无法下笔了。大家认为，在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以后，消除了许多障碍，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存真求实”的原则也好贯彻了。我们一定要以对革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力求存真求实，把有价值的史料抓紧征集到手。

（下转第11页）

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全体会上的发言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王煜文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今天的会，首先我们听了各业务组的工作汇报，了解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新建立以后，根据五届全国政协章程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现代史、革命史资料”规定广泛发动老同志和社会各界老年人士撰写史料。共编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八期（印出五期），供给历史研究部门和有关单位参考，推动了文史工作的开展；同时，通过文史工作，加强了与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社会老年人士的联系，调动了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积极性，这样，既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又挖掘和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革命史资料和近代史资料。其次，通过工作实践，各业务组的征稿工作和办公室的组织发动、出版编辑与资料管理等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革命史料的征集是一项新工作，现在已经初步摸索到一些线索，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要把精力重点放在征集地方革命史料方面，同时兼顾到其它方面的革命史料，政治军事史料组采用广泛发动、重点组稿的原则，组织力量“抢救”有关北洋和国民党军政方面的史料，征集了较好的稿件；经济史料组发动社会老年人士力量，组织金融史料专题组，培养骨干，广泛串连，挖掘了稿源，弥补了干部人力不足，并扩大了与社会老年人士的联系；工商史料组则利用个别走访与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运用集体智慧和力量，互相补充印证。并利用各区民建工委的恢复活动，进行试点，收集历史较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史料；科技文教组工作开

（上接第10页）

委员们还就一九八〇年的文史工作设想进行了议论。大家同意今年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主要是提高史料的质量，计划征集一百五十万字，革命史资料的征集重点是天津早期党的活动史料、“一二九”运动史料等，现代史资料要继续征集、编写租界、金融、海关、盐务、税务、北洋大学以及严范荪、卢木斋等史料。大家决心，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再接再厉，进一步广泛发动老干部和社会老年人士，开展调查研究，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并要不断地提高质量，改进《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为今后长期征集工作打下基础。

展较晚，重点抢救有关《南开与张伯苓》的重点史料，同时把工作开展到学校，医务和新演史料等方面。通过今天会议的交流，彼此启发，相信会对今后征稿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今天的会议，各位委员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过去一年来的文史工作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的会议虽然时间不长面开得生动活泼，说明委员们都关心我们的文史工作，也是对今后作好文史工作的推动力量。总的来讲，一年来的政协文史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

(一)

一年多以来，我们政协文史工作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首先是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关怀，我们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恢复得比较早，市委负责同志对文史工作不断给予关怀和指示；其次，有关部门如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博物馆、党校以及、天大、师院高等院校研究部门都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还有一点，就是委员们的共同努力，加上办公室同志们认真努力的工作。这三方面也是我们的工作得以较早恢复和顺利开展的基本条件。在这里，我认为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在这一年工作中，我们有些委员的确非常支持文史工作，例如李麦同志在百忙中不但主持领导革命史料组工作，发动老同志提供革命史料，而且亲自带头撰稿，李金生同志长期患病，在医院里还动员老同志积极征集革命史资料，黄逖非副主席一直领导文史工作，在金国五届政协二次会议时参加了全国文史资料座谈会，代表我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作了书面发言，受到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同志们的重视，并且经常审阅有关军政史料稿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指导了工作的开展，黄征生副主席非常关心科技文教史料工作，亲自为《南开与张伯苓》史料撰写稿件并提供线索，甚至在到三省参观旅途中以及后来到北戴河等地休养期间还赶写史料，精神极为感人，何宗谦副主席发动工商界老年撰写工商史料，并亲自提供和搜集有关《卢木斋》的资料；杨天受委员领导经济史料的工作，亲自征集有关银行与钱庄史料，现已取得初步效果，并亲自审阅有关《北四行》稿件，非常认真仔细，纠正了稿件中错误不实之处，补充了重要史实。同时，随着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恢复活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非常重视文史工作。如民革有三位专职人员负责搜集整理史料，已提供了几篇有价值的好材料，如《高树勋同志的一生》，目前正在组织有关天津早期体育界的史料；农工负责同志正在协同文教组组织医务界稿件，各区民建工委对文史工作都大力支持，宗教界爱国会的几位委员一直认真带头撰写稿件。周启圭委员长期住在北京，不避寒暑，不怕路远，走访老年人士抢救资料，不少政协委员不但经常询问关心《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出版情况，而且在出

版后仔细阅读，并指出稿件中的差错，提出不少宝贵的建议，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去年因病逝世的政协副秘书长叶刚侯同志在逝世前两天还阅读《选辑》，并对文史工作给予鼓励。此外，南大、师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博物馆、人民出版社在工作上大力协作。以上这些情况，令人非常感动，同时，对文史工作起到很好的鼓舞和推动作用。总之，我们的文史工作已经停顿了多年，委员会重新建立一年多以来，工作仅仅还是开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步子迈得还不大，工作质量也有待于提高。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我们三、五年努力赶上。

(二)

下面，对今后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认识。

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起来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就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建立起来的。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同志曾经指出：“文史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们党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近、现代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现在，很多人都老了，但我们写的亲身经历的史料很可贵、很难得。因此，文史工作很重要，也是很光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其他工作更重要，因为你们搜集、整理、编写的史料，关系到这一代、下一代，甚至更远”，他还指出：“我们政协搜集文史资料，有许多便利条件。我们是全国性的统战组织，二千零一十六名委员，还有他们以外的许多有用人才。现在虽然搜集的是资料，但如同建一座高楼大厦，这就是砖瓦，甚至是栋梁，都是有用的东西。所以，文史的同志一定要把它看成光荣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全国人民要在八十年代做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必须研究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从实际出发。要了解历史，必须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去年春天，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同志在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强调史料的作用，他说：要使历史研究的工作发展起来，必须使资料成为容易得到的东西。没有资料，研究什么？过去研究工作不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资料，因此，国内外历史学界都非常重视史料工作。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革命史和近代史资料工作的一部分，作为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必须围绕这个新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起来，是摆在我们文史工作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

新课题。一年多以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文史工作的开展，时间的推移，从征集资料的时间极限和内容上，都需要根据新时期的新任务进一步部署我们的工作。

从时间上来说，随着岁月变化，人事凋谢，必须抓紧“抢救”文史工作。邓小平同志说，搞四个现代化，一天也不能耽误，我们对文史资料的“抢救”更是一天也不能耽误。我们除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抓紧“抢救”亲自经历五四运动以前的老人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外，征求工作重点必须抓紧搜集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史料，否则就会滑过去，必须掌握时机，把他们所掌握的史料抓到手。同时，建国前后的史料，也必须同样重视。

从内容上来说，五届政协以后，由于许多革命老同志参加了政协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增加了革命史的内容。这是政协文史工作的新领域，由于我们一直没有撰写这方面史料，因此，必须把“抢救”革命史料放在重要地位，重点地征集天津地方革命史料，解放前的地下工作和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史料都要逐步开展起来。

此外，在深入征集政治、军事、文教、社会的史料的同时，要努力征集我国经济史料，如农业、工商、财政、经济、国防、科技等方面的有关史料，以有助于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应当看到，文史资料工作不仅是为历史科学提供有史料价值的资料，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而且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人士积极性，给退休老年人士提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一条途径，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教育后代，都是有深远意义的。因此，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光荣的任务。

二、进一步明确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特点。

政协文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士座谈会上的指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明确了。

因此，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与其他单位如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历史研究部门的文史资料工作相比较，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第一、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抓活的第一手资料，即组织身经中国近现代事变的当事人，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所见、亲身所闻的“三亲”真实的事迹，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也搜集他们所保存下来的历史原件，如函电、日记、手稿、遗作等。这样的当事人写当时事，只要能坚持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无疑是第一手或近于第一手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后经过互相补充和纠正，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准确的、在国内一般档案上都无法得到的史料，这是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第一个特点和优点。因此，我们政协搜集、整理、编写文史资料不摘录引用出版的书报刊物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而只用以参考、核实和印证。第二，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不单纯是项文化工作，同时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它调动了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如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如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各界社会老年人士，他们既是文史的当事人，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撰写文史资料，把他们“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是促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一個很好的工作领域和方式。这样，既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又挖掘和保存了近现代史的资料。我们编辑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是我们文史工作的成品，对提供专业部门参考和推动文史工作是很重要的，但它只是我们征集到的史料的一部分，不是代表文史资料工作的全部成果。应当看到，通过史料工作对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切党和各方老年人士的关系，加强和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之间的联系，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在贯彻统战政策、重新进行统战教育的今天，开展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当受到重视。第三，文史资料工作也为教育后代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使青年了解旧社会的苦难，了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旧中国的各种罪恶，就是周总理指出的“使他们知道老根子”，同时了解前辈为革命英勇斗争的史实，对于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深刻体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今天的幸福生活，正确认识当前大好形势，树立起为祖国实现四化的雄心壮志，都是很重要的。此外，通过征集真实的历史资料，对推倒林彪、“四人帮”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任意歪曲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具有重大意义。以上这些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和作用，全国政协文

（上接第5页）研究历史问题需要它，自不待言，即使研究现实问题，也是需要的。因为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在进行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实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然不能思想僵化，固步自封，搞经验主义，但并不否定历史经验的参考价值。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要联系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否则，很难获得正确的认识。历史资料的宝贵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显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撰写革命回忆录，是很值得提倡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我们老同志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协文史资料，需要多刊登一些革命回忆录。让我们老同志开动脑筋，拿起笔来，为文史资料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作出一点贡献吧！

（一九八〇年五月）

史办公室主任董一博同志已经加以总结，一年来，我们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全国政协的精神开展文史工作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发挥它的特点和作用。

三、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提倡存真求实，进一步提高史料的质量。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我们的史料工作逐步展开，稿件逐渐增多，有必要强调坚持二十年前周恩来同志为我们确定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撰写史料，一定要存真，要实事求是。这条原则能否贯彻执行，对于提高史料的质量，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打破这些年来一切人为的根柢和禁区，解放思想，不畏“歌功颂德”之毁，不避“树碑立传”之嫌，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科学态度，忠于客观事实，大胆地搜集、整理和编写史料，历史史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反映，凡是真实的历史史料，它就具有一定的质量和学术价值，反之，如果与历史的真实不相符合，甚至是弄虚作假，编造伪品，虚构事实，那就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我们要以对革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力求存真求实，把有价值的史料抢救到手，编印出来。

同志们：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和政协其他工作一样，任重道远，大有可为。新形势、新任务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通过今天的会议，让我们所有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使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绩！

祝大家身体健康！

（本刊有删节）

新书简介

张治中先生遗著《我与共产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曾两次合作，但终因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破裂了。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取得了胜利。这是一部翻天覆地的历史。张治中先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事变，他的遗著《我与共产党》，就是他在一九二四到一九四九年和共产党接触与交往的亲身经历的记录。该书将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溥仪在伯力拘留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州国傀儡政权随同瓦解。伪满皇帝溥仪一行被俘后送往苏联。

该书的作者是溥仪的弟弟溥杰，妹夫万嘉熙，侍从毓瞻。书中记述了他们一同被俘的经过和一同在伯力收容所五年的生活，既有历史史料，又有故事性，值得一读。该书将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